

【读一个人,读向更深邃的人生】

扫码提取
更多作家与记者的对话

作家梁鸿再说“梁庄”——

所有的悲欢,都来源于我们试图相通

本报记者 张瑾华

跟梁鸿对谈的那几天,这位著名作家、学者正忙不迭地动用自己的知识和见解,“对付”读中学的儿子。

家里茁壮成长中的“后浪”正在以越来越自成一格的“新思维”挑战“前浪”,母亲因辩不过少年给她地上的“哲学科学课”时有困扰。另一方面,梁鸿是一位“不够洒脱”的母亲,这些年无论多忙,她一直不曾缺席儿子的成长,陪他度过了很多阅读时光,现在,她感觉到不完全是她在教他,他也在教她。

生于1970年代的梁鸿,从“梁庄”出发,这些年早已读过万卷书行过万里路,但梁庄的泥土仍在她脚下,梁庄的“神圣家族”还有更多的声音想发出。

最近,梁鸿推出了新长篇小说《四象》,里面的乡土人物的根与魂缠绕故乡,从未离开过“梁庄”。



梁鸿

“

作家,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。

《四象》跨越生生死死

这些年,梁鸿是执着的乡土中国的亲历者与观察者。一个爱与痛纠缠,在中国城乡大迁移中归去来兮的“梁庄”横空出世。在以“梁庄”为主场的叙事上,梁鸿又尝试了从非虚构到虚构的跨越。

《四象》是《梁光正的光》之后,又一部更特别的长篇小说。主角是一个在墓地边放羊的精神病人和三个亡灵,就像梁鸿在“后记”中说的,死者不会缺席所有的人间悲喜剧。《四象》跨越生生死死,成为评论家笔下的“魔幻现实主义作品”。

中西方文化不同,比起死,中国人的乡土文化更爱谈论生。我好奇梁鸿如何在写作此书的日子面对那么多已经作古的梁庄人?她说,“其实还是有压力的,但有的时候就是你在写作过程中,这又是一个故事,你在摆弄框架,又有一个疏离和创造的感觉,所以也并非是那么完全的压抑。”

日有所思,夜有所梦。在写《四象》的日子时,梁鸿确实经常会梦到一些人物。“这个时候其实还是对我内心影响挺大的,我觉得自己写作以后真的是‘人我不分’,‘人戏不分’的那种疯魔状态,经常会有这样一种恍惚,做梦本身就是那种恍惚状态,也可以称为迷醉状态。”

梁鸿笑称自己不太女人,很多人都说她特别不像女性,不过熟悉她的朋友,又能发现她其实有非常女人的感性的一面。她在倾听别人的故事,或叙述自己的故事的时候,非常容易进入一种与他人“共情”的状态。

听着听着,说着说着,她时常眼圈红了。

在生活中,梁鸿泪点有点低,但写作中的梁鸿,却时常提醒自己克制情感。

“我会有意识地去克制一些抒情性的东西,但总体而言,那种感性的东西,对一个作家来说,是一种很好的写作和生成力量的起源,而不应看成一种阻碍,最终你不管是用冷峻的笔法,零度叙事的笔法,还是什么样的笔法来写,情感这东西都应该成为你最初生成这个文学作品的一个根本。”

“梁庄”不仅仅是一个村庄

《四象》注入了梁鸿极大的情感,《四象》又是一个寓言,小说经过春夏秋冬,经过自然的荣枯,有各种残酷又粗砺的描写,生命来了又消失了,她勾勒出百年来乡村社会的生态,这“四象”,仿佛同时受着时代风云变幻和乡村宗族自有生存法则的双重作用力。

书中有一句话,“人得有根,人无根则无性”,那么“梁庄”的百年(事实上不止百年历史),不变的东西是什么呢?

梁鸿说,她所说的“根”,可能更多地是指一些恒定的东西,譬如大自然,譬如人类灵魂中对善良纯真的敏感。这些东西所派生出的,譬如对家的爱,对历史的关注,等等,这是不变的东西。

“反而,对于‘村庄’本身的兴衰,我倒并不真正在意,那只是物质的载体。‘梁庄’给予我的归属感,不是‘村庄’这一形态本身,而是村庄里面所包含的生命、岁月和记忆,它们和那条河,那片墓地,那些房屋一起,构成一个人认识世界的起点。”梁鸿说。

接下来的写作,会不会“离开”“梁庄”?梁鸿透露,写完《四象》,她手中还有好几个题材在琢磨,她相信肯定有一天,她会脱离“梁庄”、家族的这个叙事中心,打开另外的天地。

“突然一想,原来真的是跟家族关系还始终没有脱离,但是我觉得写作是一个漫长的过程,你毕竟还在生,还在活,有一天你一定会跋涉出来,会到另外一个方向去,其实有另外一部小说,我已经准备了十几年,光提纲都写了好几万字,一直在那放着呢。”

梁鸿,中原女性的身体仿佛是一个蓄满情感的仓库。在梁鸿身上,你会相信:一个人只要活着,就有无限的可能性。

对谈

钱江晚报:《四象》仿佛给梁庄打开了更广阔的一个天地,它的故事跨越了三个庚子年。您从纪实梁庄、虚构梁庄,到打通地上地下,跨越百年的魔幻梁庄,“梁庄”这个梁鸿创造的地理符号,还将怎样生长下去?

梁鸿:对《四象》而言,“梁庄”可能只是一个符号,一个中国大地上的村庄,与真实的“梁庄”之间是亦真亦幻的关系。因为每一个村庄都可能有这样的故事,这样的人物。但就我自己而言,“梁庄”是一棵不断生长的大树,是那条永远奔腾的大河,是那个有着墓地的高高的河坡,世界上所有的人都会来到这里,生活、创造、失去,最终生成一个新的“梁庄”。

钱江晚报:《四象》里的那个反复出现的河坡,记得好像你在一个回故乡的纪录片里也出现过。您通过多重写作,是否认为“梁庄”的自然风物与生生死死,可以指代中原的乡土中国发生的一切人间悲喜剧?

梁鸿:鲁迅先生曾经说过一句话,“人类的悲欢并不相通”,这是人性本质的狭窄之处,但是,另一方面,人类所有的悲欢又都来源于我们试图相通,所以,才有欢乐、嫉妒、愤怒、悲哀,等等。再回到你的话题上,“梁庄”所代表的并不只是中原大地乡土中国的悲喜剧,它是人类试图相通的一种样态,是人类情感大家园中的一份子,其内在的情感是普遍性的。

钱江晚报:《四象》里的黑林子是种象征吗?感觉是在桃花源和人间地狱之间。你在构建一个桃花源,同时又很快打碎它,揭露它?

梁鸿:是的,“黑林子”确实是一种象征,因为整本书是带有很强的一种象征的味道,那样一个大院就曾经代表一种知识,一种现代开放的一个地方,然后变成一个黑林子,一个关押犯人的所在,一个历史的象征。同时“黑林子”也是现实生活里面一个点,你说一个污点也行,一个不能随意消除掉的,或者不能让我们绕过去的一个点,因为每个人的生活都会受它的影响,所以在某种影响上,黑林子跟桃花源是一个相对应的概念。

其实我一直有一种说法,就是从来没有“桃花源”的一个乡村,因为乡村里边住的也是人,只要有人,就有人性的各种挣扎,各种表现,而在中国,由于乡村是一个家族宗族为主的存在,所以他更多地体现出人在这样一种文化制度之下的挣扎,更多地显示出一种家族性和传统性,但是,这并非是人物的唯一特性,它只是特性之一。所以我觉得,“桃花源”可能只是我们心中的一个乌托邦,一个理想,我们在城市也可以建造一个桃花源,只不过在中国的传统文里面,桃花源更多的指向乡村。

换句话说,其实“乡村”并不是一个终极所指,比如说当现在生活不如意的时候,当现代文明发生问题的时候,我们一下子就把目光拉回到“乡村”,好像“乡村”里的种种才是我们应该有的,这种二元对立的晃动,这种悖反,特别值得我们思考,不管是“梁庄”、还是《神圣家族》还是《梁光正的光》,其实我都想避免这样一种终极所指。

钱江晚报:贾樟柯曾说“梁庄太不女性”了,跟以往70后女作家成为“网红”时的写作完全不一样,您在写作时,有没有被“女性”身份干扰过呢?还是写作的时候是完全忘记性别的写作?

梁鸿:可能大家有一种认知惯性吧。你或许说不清楚女性是什么,但你一定会知道,“这个太不女性了”。作为一个“太不女性”的女性写作者,写作时可能会忘记性别因素的存在,但因为你是女性,对女性命运的体会肯定不同于男性,所以,自然,多少都会些性别视角在里面。我反而认为,一个现代作家,不管男性还是女性,“性别意识”是一种最基本的意识,这几乎可以算作是一个评价标准。这样说是不是太苛刻了?但应该就是这样。